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Outline of great books

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

〔英〕哈麦顿 (J.A. Hammerton) 编 柯柏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Outline of great books

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

〔英〕哈麦顿（J.A.Hammerton）编 柯柏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745-8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名著-介绍 IV. ①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15号

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22.7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45-8/Z.059

定价: 110.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

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 1773 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 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

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

续 19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 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

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

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英〕哈麥頓 (J.A.Hammerton) 編 柯柏年 譯

世界社會科學名著精要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自序

這本書是從英國的哈麥頓爵士(Sir J. A. Hammer-ton)所編的名著精要 (Outline of Great Books)選譯出來的。原書是摘取二百五十部世界名著之精華而成的；我所選譯的只是關於社會科學的一部分。

這本書有一最大的特點，就是，所用的文句並不是編者寫成的，而是引用原文的，換一句話說，是節約原書而成的。所以，讀者還能窺見原書之真面目，不過是簡約的。這與“名著解題”一類的書是完全不同的。

這樣的書有四種功用：第一，凡是沒有功夫讀原著的，從此書可以窺其大概；第二，凡中國還沒有譯本的，不識外國文的讀者，也可從此書得知那些名著底概要；第三，凡打算讀原著的，先讀此書，就可得知其要點，一方面既可引起他讀原著之興趣，另一方面又可幫助他對於原著之理解；第四，凡已讀過原著而已忘記的，可以用此書以複習。

我譯述時雖是很小心從事的，但錯誤在所難免，萬望大家指正。

柯柏年 三月六日

目次

一	辯訴	柏拉圖	1
二	理想國	柏拉圖	13
三	饗宴	柏拉圖	33
四	倫理學	亞里斯多德	45
五	政治論	亞里斯多德	65
六	烏托邦	摩爾	83
七	霸術	馬基雅弗利	93
八	學問的前進	培根	105
九	戰爭與和平之權利	格洛秀斯	113
一〇	方法論	笛卡兒	131
一一	利維坦	霍布士	145
一二	倫理學	斯賓諾莎	159

一三	人類悟性論	洛克	169
一四	人類知識原理	柏克立	181
一五	社會契約論	盧梭	191
一六	道德與政治論文集	休謨	201
一七	國富論	亞當斯密	215
一八	純粹理性批判	康德	227
一九	實踐理性批判	康德	241
二〇	道德與立法之原理	邊沁	255
二一	人權論	佩因	271
二二	人口論	馬爾薩斯	285
二三	人類的職務	斐希德	299
二四	意志與觀念的世界	叔本華	309
二五	實證哲學	孔德	321
二六	功利主義	穆勒	339

柏 拉 圖

辯 訴

柏拉圖(Plato)的辯訴(Apology)是在蘇格拉底(Socrates)受審數年後發表的，敘述蘇格拉底被控誘壞雅典青年開審的情形。蘇格拉底不只是反對者對他有所誤解，就是信從者也大半對他不十分瞭然。雅典的資產階級以爲蘇格拉底是要把他的學生們變成爲苛刻的批評家，驕傲的自滿的革命家。蘇格拉底所從事的雖是以破壞的批評爲主，但他不只是破壞還有建設的主張，要以之代替他所破壞的。他的死使他不能傳播他的主張。這篇辯訴對於蘇格拉底的最重要的主張都說及，使世人對於他能
有正確的認識。

柏拉圖是古代的希臘大哲學家，生於紀元前四百二十七年，死於三百四十七年。他是唯心論哲學的大師。這篇辯訴已有中譯本，見柏拉圖五大對話集(國立編譯館出版)及柏拉圖對話集六種(尙志學會叢書)。

一、公訴狀與實在的控告理由

雅典人，控告我的人們所說的話，雖然頭頭是道，但沒有一句是實在的。最使我驚異的，是他警告諸君不要被我的極致的雄辯所欺騙；因為我是毫不善辯的，除非把說出真理就當做是雄辯。我只用日常的辭句，不加以修飾，不用預思而隨口說出。我年已七十，但這次的對簿法庭還是生平第一遭，對於打官司的技術是毫無經驗的。我所請求諸位的，是留心於我所說的話是否正當。

我要爲自己辯護，應先答覆安尼托斯(Anytus)以前的以及後來的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話。這些人物雖是精巧的，但我對於下面這一種人更加駭怕——他們當你們在少年時代，就警告(不合事實的警告)你們不要上蘇格拉底的當，說蘇格拉底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物，不論天上的或地下的事物，都要論究，而且要把壞的說成好的。他們的攻擊是比較來得巧妙的，因為一個人的行爲如果是他們所說的那樣，你們一定以爲他是不信神的了。我不能把這樣攻擊我的人物，一一指明出來，只能說其中有一個是喜劇作家；我不能對他們各個駁覆。但是，我一定要爲自己作簡短的辯護。癥結何在，我想我是知道的；不過結果如何，那就要聽憑神意了。

這種攻擊的根據是什麼呢？麥勒托斯（Meletus）之攻擊我是以什麼為根據呢？‘蘇格拉底是一個惡人，他很忙碌，他窺探天上的和地下的事物底真相，並且教別人也跟他這樣做。’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所著的喜劇中的蘇格拉底的行爲就是這樣；這是你們所知的。我對於這種質問是不想回答什麼話的；但麥勒托斯不能用牠們來攻擊我，因為我與牠們是不相干的。你們之中，有許多是嘗聽過我的演講，但我的演講從沒有涉及那些題目。從這一件事，你們就可看出其餘的攻擊我的話是真是假的了。

又有人攻擊我授學收費；這也同樣是不實在的。哥爾期亞（Gorgias），普洛狄昔斯（Prodicus），與喜庇亞（Hippias），往來於城市，招引青年們與他們談話，而收受青年們的修金；像他們這樣的能夠把智識授人，那是很好的。我又聽說有一個巴羅（Paros）人，名字叫做厄微那斯（Evenus）的，現在也是這樣做，收費五個‘密那’（Minæ）。具有這種寶貴的智識——假如他們實在是具有這種智識的——以之傳授他人，那一定是愉快的。我自己也想要這樣幹，可惜我並不具有智識。

你們或者要說，“那末，蘇格拉底，你的麻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假如你沒有什麼特異的行爲，這些謠言和毀

謗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把對於此事的解釋告訴你們。這是因為我好像具有某種智慧——完全不是和上面所說那些人物那樣超人的。我並不是驕傲而說這句話，但是根據特爾斐(Delphi)的神籤而說的。特爾斐告訴察勒芳(Chaerephon)——你們是認識這個人的——說：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智的。我自己是不知道我有智慧的；但神的話又是不會假的。那末，他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要找出他的意思，就去謁見一個以賢見知於世的人物，想要證明世上有一個比我更智的人。但是我發見出他毫不賢明，雖然他自以為智。我試以此告訴他，但他只是很生氣。我就得到這樣的結論：他自以為具有智識，我却沒有這樣的幻想，那末，在這一點我是比他智了。凡有賢名的人物，我都一個一個試過；使我成為一個很為人討厭的人，因為結果多是相同的。詩人、政治家、工藝家，都是這樣。工藝家對於他自己的那一種工藝是知道的，因此，他們就以為對於一切的事物都知道其一切的。

我繼續地利用每一機會來找出那些以賢聞而又自以為賢的人是不是實實在在賢的，並且指出他們並不賢。因為我暴露他人的無智，他人就說我有智；其實是不確的。而且，我因此而成為許多別的誣謗的對象。許多有地位的